

# 崇文与尚质： 明代两部《朝邑县志》的撰写体例与志学观念<sup>\*</sup>

关永利

**提 要：**明正德年间出现的《朝邑县志》，颇受后世的好评。而在其后六十余年问世的《续朝邑县志》则名声远不及《朝邑县志》。对于此两种志书的评价，学界也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这是两部各具特色的县志佳作。它们在志书繁简体例、资料选取角度，以及语言特色上各有不同表现，这与编纂旨趣及当时学术思想有相当关系。

**关键词：**朝邑县志 续朝邑县志 撰写体例 志学观念

明中叶，关中地区出现两部以朝邑县为描写对象的县志，一部是正德年间王道修、韩邦靖纂《朝邑县志》（下简称《县志》或韩志），另一部是万历年间郭实修、王学谟纂《续朝邑县志》（下简称《续志》或王志）。韩志与王志虽相间隔六十余年，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韩志甫出，当时名儒康海、吕柟为之作序，吕柟认为该志“纪录质实而文采焕炳可诵”<sup>①</sup>，可谓“简确之编”，受到普遍的关注和好评。<sup>②</sup>万历年间，距韩志问世已40年，其热度仍不减当年，雷士楨说道：“不佞壮游上国，四海荐绅知其为朝邑人，靡不乡之索邑志者，曰五泉韩大夫之所为也，核而文，约而能该，不可以莫之购睹也，不佞应之日不暇给。”<sup>③</sup>韩志曾多次再版，据冯宝琳《正德朝邑县志的版本问题》一文统计，其版本包括刻本和抄本多达37种之多<sup>④</sup>，亦可看出其受众之多。王学谟在修撰《续朝邑县志》的过程中，一方面承受韩志盛名压力，“五泉韩先生诚俊人也，出其鸿笔，质而不华，论而不议，亡所事奇，而超然玄览，四方学士翕然称之”<sup>⑤</sup>；另一方面又痛感自韩志之后，“时易事起……故实阙而不录，后之君子将焉镜考邪”<sup>⑥</sup>的现实，由是坚定其完成续志的决心。对王学谟修志心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出准确而深入的分析：“初，正德己卯，韩邦靖作《朝邑县志》，当时号为佳本。学谟此志成于万历甲申，继邦靖之志而作，故以续名。然名为续邦靖书，而邦靖所录，此志仍录，盖病邦靖之略而欲以详贍胜之，特以邦靖名重，不敢讼言相攻，故讳曰‘续’耳。自序谓‘匠意缀词，稍稍自异’，其大旨可见。”<sup>⑦</sup>王学谟续修《朝邑县志》的工作主要体现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19XZW015）、运城学院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项目（项目编号：XK2019077）阶段性成果。

① 正德《朝邑县志》卷末《朝邑县志后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1册，第13页。

② 参见正德《朝邑县志》卷末《朝邑县志后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3页。

③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雷士楨序》，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第2页。

④ 冯宝琳：《正德朝邑县志的版本问题》，《文献》1989年第2期。

⑤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5页。

⑥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5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4《史部三十·地理类存目三》，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399页。

在两方面，即“匡其所不则，而辑其所未逮”<sup>①</sup>。具体而言，一是纠正韩志中因某些材料选取不当而导致史实失真的不良倾向，二是补缀韩志因过分简略而导致某些必要保留而又被缺失的历史信息。王志付梓之后，也得到诸多赞誉之辞，认为它可与韩志相提并论。雷士楨评价曰：“思深哉，王大夫之志乎！文悲而壮，意亹亹而在民。韩大夫九原可起，必当相视而笑，话同心，定莫逆矣。以传之人，人其畴能轩轻之也。”<sup>②</sup>《续志》主修者、当时县令郭实认为《县志》《续志》可“并建旗鼓，可以信今传远”<sup>③</sup>。清代王兆鳌在修纂《朝邑县后志》时，将韩王二志“统付剗削，共汇一帙”，认为它们可“号为双璧”<sup>④</sup>。与上述评价迥异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认为《续朝邑县志》，“所叙录视冗滥之舆记尚为有法，然笔力去邦靖远矣”<sup>⑤</sup>。笔力，本是书法概念，在此处是指行文的技巧或文章的气势带来的感染力。显然在《提要》编纂者看来，《县志》行文较之《续志》而言，更富于感染力。那么，如何理解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县志》与《续志》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呢？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拟由两种志书志学体例观念、选用文史资料差异以及语言特色等诸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以期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 一 简志繁志之辨：崇简斥繁的志学体例观念

明代自朱元璋起，历代皇帝都重视志书的修纂，曾先后几次颁布《纂修志书体例》。上行下效，修志之风蔚然兴起。繁体志书在明代前期首先兴起，尤其是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逐步恢复，社会局面稳定，民众文化教育水平有所提升，出现方志编纂热情高涨的态势。当时方志编纂者认为方志应该载述详博，资料丰富，纤悉必具，无所不包，充分记录各个地方疆域沿革、户口贡赋、山川风貌、物产特产、风俗民情、名胜古迹、卓异人物、逸闻琐事等等。<sup>⑥</sup>他们的观点是“古史失之在略，而今志得之在详”，“事贵详，详则后有考焉”<sup>⑦</sup>，“志而不详，曷以为志”<sup>⑧</sup>。由是，出现一大批篇幅冗长、记载详备的繁体志书。当时的通志一般有六七十卷，府志一般有三四十卷，县志一般有二三十卷，多数长达数十万言。其实，这种“繁体”志书也出现不少繁而不乱、详而不芜的佳作。这是由于主修人针对繁体志书提出相应具体精准的要求，诸如“纪述必详，取去必当”；“夫志欲详，弗详弗备；志欲实，弗实弗信；志欲文，弗文弗工”<sup>⑨</sup>。周希哲、张时彻纂修的嘉靖《宁波府志》，共42卷，51门，50万余言。该志收集资料颇为丰赡，凡历代国史、旧志、碑铭、志状、序记以及稗官小说、均在摭摭之列，故载述甚是详尽。仅田赋一门，不仅有官田、民田之数目，而且还有涂田、粮长没官改正田、为事没官田、经社田数目以及征科米数，以及官员职田科米数，等等。时人称其“创承故实，综核悉备，视旧籍盖不啻数倍详焉”<sup>⑩</sup>。但有些志书过分追求繁

①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7页。

②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9页。

③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2页。

④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4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4《史部三十·地理类存目三》，第399页。

⑥ 参见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82—86页。

⑦ 嘉靖《常德府志》卷首《陆邨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81年，第7页。

⑧ 嘉靖《尉氏县志》卷首《周景濂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页。

⑨ 万历《金华府志》卷首《金华府志序》，“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2页。

⑩ 嘉靖《宁波府志》卷首《范序》，“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6页。

富，致使分类繁琐，体例杂芜。正如康海所言：“余读郡邑志，盖将极天下之撰矣，然盖繁而不能详，晦而不能白，乱而不能理焉。”<sup>①</sup>如弘治《句容县志》类目多达124种，嘉靖《兰陵县志》竟多达120多目，某些细目区分繁琐。弘治《句容县志》人物类，细分25目，如名宦、师儒、流寓、忠勋、文人、忠节、贤良、进士、乡举、岁贡、吏员、隐逸、义门、孝子、顺孙、义士、节妇、寿官、义官、医术、能书、善画、仙释、方技、异行等。此类繁体志类目设置繁简未必妥当，名称排列不尽科学，所记内容亦颇为芜杂。故此，邹璧针对过于繁详的志书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志贵详，详而不节，其失也浮；事贵核，核而不精，其失也诞。”<sup>②</sup>志书纂写要繁详，但要有节制，否则，使读者陷于材料的海洋中，而不辨真伪，适得其反。

从地域上来看，繁体志书多是出现在明朝南方和中部，这与当地经济文化水平发展程度有关。自宋元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已由北方迁移到南方，而元末农民起义也是由南方兴起，朱元璋较早占据南方为根据地，战事平息比北方要早，经济自然恢复得较快。而西北部临近蒙古大漠，容易遭受元军的侵扰，且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生产，经济发展落后于南方，文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洪武年间的科场案即可说明这一点。南方志书编纂十分繁盛之时，北方志书仍很少。据《文渊阁书目》载，当时志书总数五百余种，而西北部包括陕西仅有数十种。

正德、嘉靖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已经基本恢复，文化教育水平有较大提高，科考中举人数大为增加，还出现了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吕柟、韩邦靖等大批能文之士。他们针对当时的盛行的台阁体文风，包括志书的繁缛风格，纷纷提出自己迥异于人的见解。李梦阳《作志通论》认为志是史的源流，所谓“夫志者，史之流也”<sup>③</sup>，而史的写作要求则是“作史之义，昭往训来，美恶具列，不劝不惩，不之述也。其文贵约而该，约则览者遍，该者首末弗遗”<sup>④</sup>。他认为，作史在义上要存劝惩之义，在文字上应“约而该”“文约而意完”<sup>⑤</sup>。此种要求也完全适用于方志。虽然李梦阳没有编纂过方志，但由上述言论可见他是赞成方志应如同史书的写作那样“篇寡而字严”“辞义精详”“简帙省缩”<sup>⑥</sup>。康海对于方志的写作要求与李梦阳有相似之处。康海认为：“夫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备极其改革，省见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sup>⑦</sup>方志的作用是“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而已。然非以夸灵胜之迹，崇奖饰之细也。而撰者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观也！”<sup>⑧</sup>由此，他对当时盛行的繁体志持批评态度，“顾世多昧焉，弗知猥繁冗杂，漫不足视”<sup>⑨</sup>。他对于韩邦靖《朝邑县志》力图纠正当时繁体志书“繁而不详，晦而不白，乱而不理”的不良文风表示赞同。吕柟用“简确之编”<sup>⑩</sup>4字，既代表对韩志风格的准确概括，同时，也预示着简体志书

① 正德《朝邑县志》卷首《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页。

② 嘉靖《太平府志》卷首《重修太平府志序》，黄山书社，2009年，第5页。

③ 李梦阳撰，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第1843页。

④ 李梦阳撰，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第1923页。

⑤ 李梦阳撰，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第1923页。

⑥ 李梦阳撰，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第1923页。

⑦ 正德《朝邑县志》卷首《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页。

⑧ 正德《朝邑县志》卷首《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页。

⑨ 正德《凤翔府志》卷首《凤翔府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3页。

⑩ 正德《朝邑县志》卷末《朝邑县志后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3页。

纂写手法的即将登场与盛行。韩邦靖本人也在序中言及：“其繁简取与之间，其可议者吾不知其有几也，后之君子各以其所见，删补而更正之，犹今日焉。”<sup>①</sup>用一种自谦的态度表达他对该志编纂的满意程度。自《朝邑县志》之后，康海《武功县志》、何景明《雍大记》、胡纘宗《秦安志》、吕柟《高陵县志》等一大批关中名志相继问世，这意味着简体志书业已成型。后世诸多文人将韩志与《武功县志》并称为简体志典范之作。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11“谈艺”一节中，论及秦中诸志，他说道“志以简核为得体”<sup>②</sup>，即包括韩志。对韩志颇有微辞的章学诚也不得不承认：“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sup>③</sup>《中国方志学》也认为：“韩康二志对于纠正旧志，由于过分强调征实考信，致使行文繁多、门目琐碎、篇幅冗长的诸弊端的积极作用，则是应予肯定的。”<sup>④</sup>可见简体志的出现及流行，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当时繁体志书存在的诸多缺点，因而受到诸多方志学者的青睐及仿写。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韩志而言，由于其过简而导致许多必要信息不能获得，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志书应有价值。正如章学诚所评：“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sup>⑤</sup>刘光禄《方志学概要》也认为：“由于该志书内容过于简略，作为一方的文献，就显出了它的严重缺点，不少部分的内容，仅能起到目录、索引的作用。由于内容过于简略，其史料价值是不大的，难以发挥地方志的应有作用。”<sup>⑥</sup>为弥补韩志过于简略的不足，六十余年后的朝邑知县邀请本土文人王学谟编纂《续朝邑县志》。在《续志》的序言中，主修人郭实详论志书编写的繁简问题，这也为王学谟《续志》的编纂定下基调。他首先提出志书编写博与约的问题：“有以多为贵者，见以为博，而回冗糝谬；有以少为贵者，见以为约，而脱略故实。嗟呼，试观载籍，约而不秽，囊括无遗，将焉病之？”<sup>⑦</sup>如何处理简与繁的问题？在郭实看来，就是要做到“约而不秽，囊括无遗”，亦即是，既要做到简约不芜杂，又能够概括社会情形，无所遗漏，这就达到简与繁的最佳结合点。单纯追求简或繁，都是不对的，上述李梦阳要求作史需“约而该”“文约而意完”<sup>⑧</sup>，即体现这一思想。随着社会发展，新生事物愈来愈多，相应地，要表达的内容就愈丰富，需要的文辞就愈繁多。因此，对于之前过于简略的《县志》就有必要进行补充和修正。郭实在《续志引》中进一步申论道：“盖开物成务，结绳犹多；因时制宜，累牒不足。气化自微而著，人事自少而多。通神明，类万物，成天下之亶亶。夫非作者之圣邪？余以为后世之作史，其迹稍稍似之。事以时起，文随义生。前非故省，后非滋侈。其说在朝邑两大夫之作邑志。故志，五泉韩大夫，论纂学士，家数盱衡，击节称焉，凡以其约也。后若干年而河汀王大夫为之次，称曰《续志》，何以续？何续尔？广而博也。文约义该，博大不秽，勒成一家之言，而润色有加。至其宣蒙隶之郁滞，惘惘款款，瘵惘乃身，不翅见疾苦而闻呻吟。且也谷言绵绵，开示时务之要。有味哉！有味哉！”<sup>⑨</sup>由此可见，对

① 正德《朝邑县志》卷首《韩邦靖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3页。

② 王士禛著，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07年，第208页。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71页。

④ 王德恒、许明辉、王辉铭：《中国方志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⑤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71页。

⑥ 刘光禄编著：《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⑦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志引》，“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1页。

⑧ 李梦阳撰，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第1923页。

⑨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志引》，“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1页。

《朝邑县志》的续写是有必要的，且王学谟也对自己续写县志的定位是：“匡其所不则，而辑其所未逮”<sup>①</sup>。即是纠正韩志中不当做法，和补充他所未涉及的内容。其实，在《朝邑县志》和《武功县志》之后，关中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过于简略的志书。这也表明关陇方志学者后来意识到这一问题，而采取相应的规避措施。

## 二 取材文史之异：资料选用之学术思想差异

编纂方志的目的就是要辑存资料。富含资料是方志生命力和价值之所在。只有辑录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的资料，才算一部合格的方志。纂写方志时，在广泛搜集资料基础上，必须对资料真实性可靠性作认真细致的审查。那些未经考证的资料一旦进入方志文本中，不仅有悖于方志真实性，而且会损害方志生命力。韩、王二志都有对于杨恭任职布政使一事皆有载述，但他们所采集的资料有所出入。在此作一比较。先看原文。

韩邦靖《朝邑县志》：

杨恭至陕西左布政使。宣皇帝时，恭谒选吏部，言事称旨。即日召见。上以恭言事有才而见，又容貌伟甚，乃敕吏部与左布政使。部尚书言：“左布政不缺员，缺独陕西，恭不得往。”上曰：“朱买臣独不为会稽邪？恭奚不可陕西？”遂授恭。恭顿首固辞，上曰：“吾知若辞布政矣，顾陕西乡里，挠而法耳。”乃令恭得便宜治事，而赐免死券十道，又以子刚为锦衣指挥。始恭行时，入谢知县，知县不为礼。既得选，乃令从者不得言布政。衣故破衣，纳凭券破囊中，置驴上，骑往见知县。知县不知恭已得布政，又为陕西，劳之曰：“杨进士甚劳苦，所得何官邪？”恭曰：“比知县差大耳。”知县素易恭，闻恭言，遂怒曰：“若言官大，岂为布政耶？纵布政将如朝邑知县何？”恭笑曰：“安知非布政邪？且正能治朝邑耳！”乃徐徐出其囊中凭券，乃陕西布政也。一县人尽惊，知县卒得罪去。<sup>②</sup>

王学谟《续朝邑县志》记载：

杨恭，西庄里。初为给事中，历刑科都给事。革除间，文庙靖难，师起，朝议命曹国公统师问罪，恭疏言“宜先遣使讲和，不宜辄行征讨”，忤旨黜为蒙自县幕。文庙即位，检阅封事，诸言进兵者皆罪之，唯恭主和议，甚喜，问恭何在，征至，命除为布政使。部难之以为他省无缺，独缺在陕西，恭不得往。上曰：“朱买臣不为会稽邪？恭奚不可？”遂给敕令，令驰传往。恭徒步之官，廉，得臧吏多所贬退。居九年，以廉贞终于左使。《蓉塘集》云：“永乐二年，以刑科都给事杨恭为陕西布政使。次日陞辞。盖文献足征矣。”<sup>③</sup>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两志对于杨恭任陕西布政使的时间记录有出入，韩志记录时间为“宣皇帝时”，即在明宣宗宣德年间，而王志认为是在“文庙”时期，即是在明成祖永

①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1页。

② 正德《朝邑县志》卷2《人物第六》，“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0页。

③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6《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53页。

乐年间。那么何者为是？据《明实录》载：“永乐二年秋七月庚子丙午，升礼科右给事中张信为刑科都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杨恭为陕西右布政使，改右布政使杜智为左布政。”<sup>①</sup>且王志叙及杨恭之所以由低级的刑科都给事中擢升为高级的陕西布政使的原因，即在朱棣靖难时，建文帝朝众臣建议“统师问罪”，唯独杨恭主张先礼后兵，“宜先遣使讲和，不宜辄行征讨”<sup>②</sup>，并因此受到贬谪。后朱棣查阅档案，发现此事，由此对杨恭产生好感，遂生提拔之心，升任其为布政使，这在逻辑上完全是讲得通的。《弇山堂别集》也有记载：“永乐中，西安人杨恭自刑科给事中擢陕西右布政使。”<sup>③</sup>由此可证，此杨恭乃朝邑县人，非其他同名者。

其次，对于杨恭赴任陕西布政使的具体情形，韩志作了形神兼备的描述。皇帝为了使杨恭就任本地布政使不受挠法干扰，特地“赐免死券十道，又以子刚为锦衣指挥”<sup>④</sup>。此事颇为可疑，免死券是朱元璋对于开国功臣的最高奖赏，若大臣犯法，持此铁券可免去死刑。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功大臣，公爵李善长等6人，侯爵汤和等28人，并赐免死铁券。此后绝少有人能得到此券。杨恭对于朱棣，并无劳苦高功可言，朱棣亦不可能颁赐免死券给他。此处描写不合常理，亦无根据，有悖于方志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王世贞也看到这一点，他在《弇山堂别集》中评论道：“成庙时，有西安杨恭自刑科出为本省布政。后坐法，谪为办事官，复职卒此。必《通志》误传，况铁券免死，擢官锦衣，皆非常之典，以授一选人，甚无谓也。”<sup>⑤</sup>杨恭到达陕西之后，因之前朝邑知县对他不敬，故意衣衫褴褛，前往拜访知县，嘲弄知县一番，知县因此而辞职。原文描写绘声绘色，似乎取法《汉书》朱买臣赴任会稽太守作弄会稽吏一段。如此看来韩五泉是把方志当成文学作品来写，失去对方志真实性的要求。况且以杨恭在朝庙中为朱棣发声的所为，似乎并非斤斤计较的小人。清人陆以湑对此看得很清楚，认为韩志“记杨恭报复知县事，乃小丈夫所为，未免采择不精，未若《武功县志》之简而核也”<sup>⑥</sup>。此看法有一定道理。

再次，相对于韩志而言，王志记述就客观真实许多。他首先记录杨恭里籍，即杨恭是朝邑县哪里人，合乎方志修撰规范。其次，正是由于他的记述，是我们得知杨恭得以擢升布政使的深层次原因，这在韩志中是看不到的。再次，他对于韩志的描写并没有硬搬照抄，而是有取舍的，他不录免死券事和报复县官事，是符合方志写作要求的。最后，他引用文献证明杨恭被擢升之事是真实的，这也合乎方志求真的基本准则，也增强了方志的可信度。

方志编纂过程中，引用文人诗词时应做到完全原文引用，定要忠于原文，切忌因个人疏忽而有所改动。韩志在介绍蒲津古渡时引用了唐玄宗的诗歌。原文如下：

唐玄宗《过蒲关》诗云：“钟鼓严更曙，山河望野通。鸣銮下蒲坂，飞盖入秦中。地险关逾壮，天平镇尚雄。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所希常道泰，

① 《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1404）秋七月甲寅、乙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77页。

②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6《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53页。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52页。

④ 正德《朝邑县志》卷2《人物第六》，“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0页。

⑤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第404页。

⑥ 陆以湑：《冷庐杂识》，中华书局，1984年，第281页。



非复候繻同。”<sup>①</sup>

《唐诗纪事》载有此诗，以此与韩志中引文作一对校，可以发现，原文作者应为唐玄宗而非唐元宗，此处应是避康熙皇帝讳，故置不论。另外，引文有两处错误，唐玄宗诗歌名为《早度蒲关》，而在韩志错引为《过蒲关》。这一疏误在王志中得到纠正，该志引用的诗名即为《早度蒲关》，可见王学谟对于韩志是经过一番认真阅读和细致辨误工作的。不过还有一处两人均未察觉，即第二联第二句“飞盖入秦中”，《唐诗纪事》中原文为“飞旆入秦中”，“旆”，即旆，《说文解字》解释为“继旒之旗也，沛然而垂”，即旌旗。“飞旆”是形容皇帝扈从众多，旌旗随风猎猎招展的宏大场面。这与诗歌所描写的场景更为吻合。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朝邑志后》指出《朝邑县志》的“三谬”，其中有“两谬”即是从材料选用方面提出。章氏指出：“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sup>②</sup>关于程济在靖难之役中救助建文帝之事，民间有许多传说，并被好事文人大量写入各种笔记及野史中。诸如《明史演义》《续英烈传》《明语林》《明史纪事本末》皆载程济之事，即便《明史》中也说道“程济，朝邑人。有道术”<sup>③</sup>。程济此人历史上确实存在，也曾辅助建文帝于危难，但并没有什么法术，否则的话，他用法术直接杀死朱棣就行了，还费那么多事来帮建文帝东逃西藏，四处流浪。章氏又言：“并选举于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sup>④</sup>韩志记载明代朝邑籍进士、举人名字，但名没有记录他们的登科年月、里籍，使读者不能进一步地了解相关信息，无法作深入调查，这是韩志选材又一缺憾之处。是不是这些登科进士举人的里籍、科年因资料缺失，韩五泉无处可考而阙录呢？情况并非如此，这些信息，在王志中都有所载录。

由此可见，在方志修纂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材料选择问题，要选择那些有真凭实据，有资料可供验证的材料，同时还要认真核对材料真伪和细节，使方志真实性、客观性落到实处。韩五泉《县志》材料的选用方面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试想他在编纂此志时，身居乡村，时间仓促，搜集整理资料不便，事实难考，可想而知。而王河汀为编写《续志》多方搜集资料，“广延问于方闻之士，关览乎百家众氏”<sup>⑤</sup>。他也谈到资料搜集之难，“顾旁搜之难，辟之食鸡积千跖，粹裘取众白，不遗余力，虑有遗珠，敢以自多”<sup>⑥</sup>。正是由于王学谟的艰辛付出，才编出这部资料翔实、新见叠出的杰作，且对韩五泉县志做了不少改进和补正，如其所谓“匡其所不则，而辑其所未逮”<sup>⑦</sup>。

韩王二人对于入志材料整理选择的差异，体现出他们二人不同的纂志理念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韩作为诗人，他倾向于把运用一种较为文学的写作手法来修纂志书。五泉在志序中有感：“朝邑旧有志，然不载高御史及刘烈女事，二人者，代不数人，顾可弗录邪？非也。奇异如程济，善终如周彧，宠任如杨恭，乃略而不书。”<sup>⑧</sup>出于朝邑曾经存在的一些

① 正德《朝邑县志》卷1《总志第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5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71页。

③ 《明史》卷143《程济传》，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第4062页。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71页。

⑤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6页。

⑥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6页。

⑦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6页。

⑧ 正德《朝邑县志》卷首《朝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3页。

奇异人物不见于志书的遗憾，而产生为之立传的想法。当然志书写作，载述当地人物的奇异之处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仅由此一点出发而纂写志书，则不够严谨和全面。因此导致他的志书出现追求“奇异”而采纳一些不够真实客观的材料。后世诸多评价，也多是肯定其在文学写作方面的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志（《朝邑县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sup>①</sup>在某种意义上，也指出《朝邑县志》笔法出处。所谓“疏宕”，亦作疏荡，指的是一种较为豪放通脱的写作风格，正与“《武功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sup>②</sup>相反。而这种风格形成，与韩邦靖编纂方志时“好奇”心理有相当关系。这也与当时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有一定联系。一方面，洪武、永乐高压态势已过去百年之久，另一方面，土木堡之变后，中央权威对地方控制相对松弛，加上弘治时期帝王相对开明政策，当时文人士子在文坛上相当活跃，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人尽管不得意于仕途，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有多样性选择，或醉心于戏曲，或流连于山水之间。志书修纂，虽然是出于其意愿或当地官员邀约，但修纂者本人的创作空间是相当自由的。而王学谟《续志》编纂，已是六十余年之后万历年间的事情了。万历早期有张居正扶持，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局面。但随着张居正去世，万历长期怠政，明帝国又出现走向没落的趋势。这一时期的士人仕途更加暗淡，王学谟早年中举后，由于敢于任事、执法严明，虽也做过一些中低层官员，诸如太谷知县、守备岢岚等官职，尽管他“振救穷人，力除贪墨”<sup>③</sup>，但最终遭到排挤。在家乡闲居十余年，正所谓“王大夫负苍生望，久在丘樊，顷天子以言者荐起之，寻不果用。岂用不用固有命？将用有其时，而未之逢也”<sup>④</sup>。王学谟沉沦之际，并未甘于堕落，而是出于“长吏披绘图，而知疾苦；台省不下堂，而悉闻阎；即天子居四累之上，万里而遥，有如问关以西名数，斤斤乎披舆图若字下”的心态，经过一番“载笔逾十年，先后阅五令”<sup>⑤</sup>的艰辛，方完成编纂。正是出于这种拯民济世、下情上达的心理，使得他以饱含感情的笔墨，真实客观地反映当时民间的疾苦。这也是《县志》与《续志》取材不同所体现的两位编纂者不同纂写意图和学术思想的差异所在。

### 三 崇文尚质之争：崇朴斥丽的文学价值取向

方志作为地区地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资源资料汇编，它首先注重资料的丰富性、真实性、广泛性。其中真实性是资料最基本要求。在保障资料真实性前提下，如何合理有效科学地编排资料，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就必须考虑应用合理的结构和体例。在结构体例确定之后，就应该考虑如何运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使读者喜闻乐见，乐于接受。因此方志语言也很重要。《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行文要严谨、朴实、简洁、流畅”<sup>⑥</sup>。方志语言要朴实无华，朴实本身也是一种语言风格，也是一种美。但朴实并不等于不注重文采。朴实应该和文采完美结合起来，方能提高方志的可读性和传播力。方志应具有一定文采，可以借用某些文学表现方法和技巧，但要有一个度，即不能伤害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我们可以将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史部第三十四·地理类一》，第375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史部第三十四·地理类一》，第375页。

③ 康熙《朝邑县后志》卷6《人物》，“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1册，第149页。

④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雷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0页。

⑤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王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7页。

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沧桑》2010年第1期。



《县志》和《续志》的语言放在一起作一比照，看看两者的语言风格有何差异，以及带来的不同的表达效果。首先，比较两志对于大庆关的描写：

#### 《县志》描写：

大庆关在县东三十里，即古蒲津关。今设巡检司，隶潼关卫，又置税课局。关东即黄河西岸，岸去水不甚高，然不溢。他处或高四五丈，辄溢。土人以为铁牛镇河，故不溢。铁牛者，唐时铸铁为牛，置河两岸，岸各四牛，各重数万斤。下为铁山，尾施铁轴，以系浮桥；旁置铁人，以象系牛。宋嘉祐中，河涨桥坏，尽曳西岸牛于河。元有僧怀丙者，乃为机法取牛河中。已得三牛，会有言：“取牛不难者。”丙怒，弃去。后人用其法取牛，然牛竟不出。今西岸止存三牛，其一牛乃在河中。始河涨时，并坏岸，元铁判院仝金修筑焉。<sup>①</sup>

#### 《续志》描写：

大庆关，故蒲津关，今隶潼关卫。故有蒲津桥，秦昭襄时，初作河桥，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而施铁牛自唐开元时，对峙河隅以维浮桥。<sup>②</sup>

两者相比较，韩志对蒲津桥介绍，仅止于其现状说明，他叙写的重点在于铁牛传说，讲述铁牛来历、人们对铁牛的迷信，以及打捞铁牛趣事，文笔生动，富于文学气息。而王志陈述则十分质朴，他简明扼要地指出蒲津桥发展历史，没有任何文学性描述。方志写作讲究的就是要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给读者以直接有用的信息。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讲故事，但前提是要能够传达有效的地理信息，实现方志的功用。

#### 《县志》对于太白池的描写：

太白池在马坊头西南三里，池周回可十余里，洞然深黑，其上常有云气，亦能致雨。池中有大鳖，常食饮马，人以为神池。北为莲池。麻子池在太白池正北五里，池回长可二十里，多莲，开花烂然映云日。池东南有安靖寺，唐元宗祀汾时，驻蹕寺中。今殿前有大柏树，悬宋崇宁中所铸钟。九龙池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池东有霸城寺。寺东北有灵应观，仙人张三丰尝憩观中，今为道会司。自九龙池东至于赵渡镇，漆、沮经焉。滨水皆种桃树，二三月时，两岸桃花纷然，三十里不绝。<sup>③</sup>

#### 《续志》对太白池的描写：

太白池周回可十里许，故志称洞然深黑，常有云气，亦能致雨。经地坂平芜，乡民争以种植，争之不得告讦纠纷。间者水稍稍如故，则又无田可耕，赋无所出，告派闾县，仰屋而

① 正德《朝邑县志》卷1《总志第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3页。

②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1《地形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8页。

③ 正德《朝邑县志》卷1《总志第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3页。

叹者有矣。<sup>①</sup>

在韩志描绘下，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太白池，那儿的春天，池边两岸皆是桃树，桃花纷然开放，连绵不绝；夏天池中的莲花卓然开放，映日荷花别样红，俨然一幅艳丽的图景！同样的太白池，同样的朝邑人，在王学谟眼中却成了一幅民众竞相抢种田地和遭水灾后哭告无门的悲惨画面。

《县志》对长春宫的描写：

长春宫在县西北原上，后周宇文护所筑。隋文帝置殿其上，以瞰河、华、洛、渭。宫下花木，四时茂盛如春，故名长春。唐高祖起兵太原，西定长安，休士于此。<sup>②</sup>

《续志》对长春宫的描写：

古迹有遗址而可称列者，县西北隅为长春宫。《十道志》曰：周武帝保定五年，宇文护筑，隋置殿其上。唐高祖起义，自河东引兵而西济河至朝邑，舍于长春宫，休甲养士，仍资永丰仓为用。后尝命太宗镇此。李怀光据此宫，马燧百计攻之不能下，曰：“三面悬绝，不可攻也。”<sup>③</sup>

韩志用四时茂盛如春，来解释了长春宫地名来历，写隋文帝登上大殿俯瞰大地气象，确实有气势。而王志则用质朴语言，平实介绍长春宫兴建过程，以及长春宫在军事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三处比较，从文采角度来看，《县志》描写文采斐然，引导受众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五泉先生作为诗人，将朝邑山山水水描绘极佳，文笔优美，令人不禁有前往观览之意。这分明不是一篇方志，而是山川游记。吕柟《朝邑县志后序》言说该志“纪录质实而文采焕炳可诵”<sup>④</sup>，诚以有之。章学诚评“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sup>⑤</sup>，确实深得其味。有人说其“可谓文人之书，辞人之志的典型”<sup>⑥</sup>，概不虚言。反观《续志》语言质朴无华，诚如《四库全书简明提要》所评“然笔力去邦靖远矣”。但这只是就文采而言，如果从志书语言要求来看，《续志》使用的是质朴、简约的方志语言，很好地实现方志功能和价值。韩王二志文风之所以表现出较大差异，首先与韩王二所处时代环境以及他们的切身体会有密切关系。韩邦靖生活在正德、嘉靖之际，当时的明王朝虽不如之前的仁宣盛世，但仍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时期。据韩五泉《县志》描述，当时的风俗：“秦民皆力农，朝邑颇事贾，婚姻论财，仕者尚廉有气，前辈

①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1《地形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8页。

② 正德《朝邑县志》卷1《总志第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3页。

③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1《地形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8页。

④ 正德《朝邑县志》卷末《朝邑县志后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3页。

⑤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71页。

⑥ 林正秋主编：《中国地方志名家传》，黄山书社，1990年，第60页。

尽然。”<sup>①</sup>王学谟也回忆道：“余少时，见少者尊事长者，行有不驯，畏人知，恐貽想里笑，衣食称乎其家。”<sup>②</sup>可见，韩五泉时民风淳朴，和睦相亲。而到了王学谟所处万历年间，据雷士楨序言，当时朝邑，面临生存种种困境，“且地震河徙而来，生齿渐凋，徭赋日益”<sup>③</sup>。朝政不振，农村经济普遍萧条，民风日下，王学谟在续志写道：“乃今小凌大，敢为不逊，怙恶不悛。家无十金之贖财，而丰衣美食，不顾其后”，“又使酒负气，聚讼纠纷”<sup>④</sup>，种种不良行为，即为明证。对此，王学谟感慨道，“长此安极”。“忧国如饥渴”的王学谟出于“宣闾阎之痛，徼休息之仁”<sup>⑤</sup>的编纂宗旨，来续写《县志》。与此相应，王学谟本人也在《续朝邑县志序》中说道：“建庶官者为众庶，敷道理者先燠休，起敝维风，惨怛民隐，此其莘莘大者。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sup>⑥</sup>与他关注民瘼，体察民情的纂志趋向相适应的，只能是这种质朴无华的语言风格。

## 结 语

《县志》与《续志》都是反映朝邑县一方社会地理历史方方面面的志书。由于纂修者的身份、理念的差异，而导致两部志书取得的成就和所得的评价有较大分歧。《县志》作为简体方志的代表，虽然在资料的搜集与篇目的编排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质量，但由于语言的文采斐然，仍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续志》虽然没有《县志》的名声那么响亮，但它确实在史家法度方面对于《县志》作了诸多的修正和补遗，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志书，而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两部志书各有千秋，正如《续志》主修人郭实所说的：“由前则韩大夫约而质，共推精悍；由后则王大夫核而文，严而有裁，号为尔雅。总之并建旗鼓，可以信今传远。”<sup>⑦</sup>对于我们今天的志书编纂，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亦即是，既要注重语言的精炼，又要言之有物；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篇幅的精简，使得必要的信息遭到缺失，使读者不明所以；也不能过分的求全求详，而使得读者陷于材料的海洋中不能自拔。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正德《朝邑县志》卷1《总志第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6页。

②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4《食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44页。

③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雷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9页。

④ 参见万历《续朝邑县志》卷4《食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44页。

⑤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雷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9页。

⑥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朝邑县志王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16页。

⑦ 万历《续朝邑县志》卷首《续志引》，“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1册，第22页。